

彭珮云：中国特色的人口控制之路(中)

马国川：还有一个问题，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要求到2000年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对于你来说,这个目标是个巨大压力。

彭佩云：这个目标是在1980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里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政府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一方面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吃掉了。”1982年“十二大”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但是，这个目标很难实现，所以后来在表述上已经开始有些变化，比如把“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

我到了计生委以后,发现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当时生育计划由国家计生委下达,哪个省份一年生育多少孩子，都是有计划指标的。1989年初我们发现,其他省市区都没有完成人口计划,只有两个地方完成了,一个是浙江,一个是新疆。

浙江工作做得好,力度大。新疆政策比较宽松,好几种政策,所以也完成了。计划生育干工作是很累人的,辛辛苦苦还完不成计划生育的任务,而且不是一个地方,这就必须考虑计划本身对不对?

马国川: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彭佩云：我这个人原来是搞教育的，我觉得当时计划生育的方法很强硬,方法很简单。即使这样都完成不了,还要加压,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费了很大的劲抓计划生育工

作，为什么绝大多数地区都完不成人口计划呢？如果一个目标经过努力也达不到的话，那就说明目标本身制订得不合理。为了制定一个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八五”人口计划,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等11家研究机构进行预测,其中也有国外的机构。预测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到世纪末差一点点到13亿，多数都是在12亿8.9这个边缘。我们与国家计委联合召开两次研讨会。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提出了制定人口计划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又应该是经过最大努力能够实现的。根据这个原则,经过反复测算,国家计生委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规划，向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国人口总数的控制目标调整为13亿以内的建议，得到了中央认可。

马国川:事实证明,这个调整是必要的。

彭佩云：1988年总人口已过11亿,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再有7年,12亿大关就被突破了。如果不调整,目标不切合实际,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完成任务，还有一个就是哄骗瞒报。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制订的人口计划必须是积极可行的。

连续召开八次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彭佩云：计划生育关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有了一个好的

职责和权力不对等,责任重大,权力很小,所以要协调各方面,促使各级党委、政府承担起责任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成人口计划。为此,我们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请求中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请各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参加。1991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郑重宣布,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央就由他和李鹏同志负总责，今后每年人大开会期间都要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马国川：以后每年两会期间都召开吗？

彭佩云：每年都召开，一直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八次。每次都是总书记、总理参加,各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参加。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如果能够让中央领导重视起来,工作就好做了。1991年中央下发了《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党政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成立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由于中央带了头，各地纷纷效仿,计划生育工作被党委、政府摆上了议事日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2年国家计生委召开会议，总结推广山东等地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经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政

领导和广大计划生育干部的积极性,对于确保人口计划的实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马国川：目标管理责任制是一个好办法，问题在于怎么防止地方上为了达到目标弄虚作假呢？

彭佩云:实话实说,弄虚作假是存在的，有时甚至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相当大。1988年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汇总的全国人口出生统计误差率高达30%，有的省甚至接近50%。90年代以来,国家计生委进行了一系列的抽样调查。1992年组织了全国38万人口的抽样调查，获得一批重要的人口数据。

马国川:我听说,1993年您还组织了一批干部直接下到农村摸情况？

彭佩云: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组织了一批干部,不打招呼,自带干粮,摸了32个村子,发现出生人口有相当数量的漏报，计划生育在基层落实不到位。计划生育工作既然难做,更要摸清实际情况。我们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召集各省计生委主任开“敲警钟会”。从1993年开始,连续4年,我们每年组织力量采取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的方式,抽查2个省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使我们对基层人口出生情况、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现状，以及统计报表的水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对每次调查的结果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向中央写了报告,同时通报各地,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各地纷纷仿照国家计生委的做法,进行各种形式的抽样调查，并采取措施制止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提高人口统计的质量,为各级党委、政府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策提供

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把计划生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马国川：在刚推行计划生育的70至80年代，国家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控制人口的增长。

彭佩云：那段时期中国的生育水平的确下降了不少，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既包括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公民的切身利益，也包括党群干群关系。正是注意到这些问题,我认为,解决问题就要加强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把计划生育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其实,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国家计生委曾几次起草全国的计划生育法,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先后形成了20多稿。1989、1990年我也为立法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一部法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这个法是很好的，但我们的计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难的，由于全国立法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我们先帮助和督促地方上制定和完善计划生育条例。1990年以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与方法,使各级干部认识到,一些人对计划生育有抵触情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会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败坏计划生育工作的声誉。所以,我们就提出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三为主”方针。就是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为主、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东肇庆成立。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第一营营长,后任团参谋长、代理团长。此即为著名的“叶挺独立团”由来。北伐路上,周士第将军率一营当先锋,打头阵,飞兵平江,突袭汀泗桥,攻占贺胜桥,激战武昌城,屡建奇功。

贺胜桥一役为北伐之关键一战。“叶挺独立团”攻占贺胜桥,即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战前,吴佩孚曾视察桃林铺和印斗山阵地,曰:“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战斗中,单独攻入印斗山附近的独立团五连,遭吴佩孚部刘玉春师反攻,三面受敌,进不易,退不许,停不久,后援乏力,形势十分危急。时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将军亲率机枪连和二营增援,将军下令将六挺机枪集中起来,一起开火,向敌之制高点印斗山发起强攻。终克之,敌大败。

萧华上将:“少共国际师”威震沙场

1933年8月5日,红军“少共国际师”于江西博生(今宁都)诞生,萧华将军任师政委,时年17岁。将军率数千“娃娃兵”驰骋疆场,先后参加了黎川战斗、团村大战、驿前战役、石城保卫战等。萧华将军战法灵活,或空城计,或拖刀计;或迷魂阵,或麻雀阵;或火攻,或水攻,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娃娃兵”威震沙场,其战斗力几与主力部队不相上下。其时,“少共国际师”师长为吴高群。

杨成武上将:长征路上过关斩将,屡立奇功

红军长征中,杨成武将军率红四团为前锋,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开山劈水,过关斩将,屡立奇功。将军作战善用奇兵,以奇制敌,以奇制胜。红四团飞夺泸定桥。战后是夜,杨成武将军随刘伯承、聂荣臻元帅登泸定桥视察,铁索铮铮,惊涛骇浪。刘帅感慨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杨成武将军言,刘帅素理智冷静,如此动情实在少见。中央军委为了表彰红四团,除了颁发一面奖旗外,还给22位首先过桥之突击队员和团长、政委发了奖: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枝钢笔、一本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抗日战争中,杨成武将军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雁翎队”于江河湖泊,创“地道战”于平原阡陌,日军闻风丧胆,望之披靡。

22.旧房子后来被拆除

蒋家巷的弄堂里，除了公安坊和姚家房产等是几处比较像样的房子外，其余的都是棚户区。我家算是弄堂口像样的房子,但也是60年如一日,房子越来越小,人口却愈来愈多。我家原先为独门进出的,客堂间借给对面纸箱厂做仓库，后来被厂家整理一下分配给职工当住房。我家前楼住着二哥一家,后楼是我母亲的住房。阁楼原先是堆放杂物,我长大后便缩到阁楼中，后我侄子成家,用去了前楼,我二哥夫妇便开始钻阁楼,那是一个高仅4尺,人无法直腰的黑暗去处。

谈起蒋家巷里的棚户，那就更惨了。我曾经到班上同学家中光顾过,全家老少三代六口人，缩在一个仅8平方米的棚户内,上面搭建了一间阁楼,自来水、烧饭都在门外。据说,有的人家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蒋家巷到了夏天，但见许多人都捧着饭碗在弄堂口吃饭。弄堂内挤满了睡露天的木板床,连自行车都无法骑。而蒋家巷的人都练就了一身骑车的好本事，能够曲曲弯弯地在人堆中穿梭而行。

1995年我带着儿子、女儿回上海时,特意在蒋家巷中里里外外地走了一圈。熟悉的弄堂,陌生的脸,所有的建筑依旧,路面依旧,只是换了人。老酒店的吴老板已过世,儿子小羊则当铺卖酒。大饼摊已成为外地人来经营的地方,油条不像当年那样金黄,买的人却还不少。人们依旧无所事事,家中房子太小,常常坐在自家门前,无神地打量着过路人。

弄堂口有一狭长棚户还在,当年是同学“小老虎”一家栖身的地方，小老虎与我同学,他的父亲是踏三轮车的工人,晚上三轮车放在棚户旁，一家四口则在棚户内度日。棚户尚在,人家确已搬走,后来成为一个公用电话亭子。在棚户前的弄堂靠马路边,又有一个用油毛毡搭起的棚,是当年的豆浆、油条摊,早上上班的人们都在此处买豆浆油条,而到了下午,则是著名的“朱大雄”卖羌饼的时候。

说起当年朱大雄的羌饼，那可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羌饼。一个汽油桶,砌成一个大圆炉。寒风中,火烧得旺旺的。我们这些没

事干的小孩子，便都围在朱大雄的羌饼摊前，这朱大雄是个年上50的汉子，左眼红肿,性情和气。但见一团面粉,在他手中,揉搓成一条面团，然后在面团里加上他自己调制的五香粉。一个扁平的圆锅中,浇上油,面团便放进去,朱大雄有条不紊地往面团上撒芝麻,有时芝麻掉在桌子，朱大雄还会拣起来一塞到围观的我们这些小孩的嘴里。最兴奋的是羌饼煎好了,朱大雄把锅盖一推,一股香腾腾的热气扑面而来，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用鼻子去迎合香气，直嗅得我们口水直流。四分钱一两的羌饼，朱大雄用一把切面刀均匀地分割,从来不用称。我有时馋得受不了,便回家去向母亲讨四分钱,买一块来吃。那寒冬的岁月,吃下这又脆又香的羌饼,真是天下第一美食。我当时不知道朱大雄在羌饼中放了什么作料,便问他,他回答说,五香粉。于是我也去店里买了五香粉,回家也揉了一团面，偷偷地做了在锅上煎,却又涩又苦。这朱大雄一定是有自己的秘方。我从此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羌饼。

蒋家巷的旧房子后来拆除。今年在静安区民政局副局长陶云的安排下,我们一行蒋家巷的老邻居俞宏根、吴文定、朱慧桢、张永泰、周福国、虞忠懋、王经强等人受到居委会主任和书记的热烈欢迎，座谈一小时之后我们来到蒋家巷昌平路的原址。哪里还看得到蒋家巷,只见一片高层住宅拔地而起,雄伟而又乐居。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原先朱大雄做羌饼的摊位原址，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

我上小学的那一年是1960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缺乏。城市里的人比起乡村来,也许要好很多,虽然定量供应的粮食减少了,但还可以有个温饱。不过上门讨饭的人增多了,大部分来自安徽、河南。凡是有人上门乞讨,我母亲总是有求必应,不管是白饭还是南瓜,都会施舍给他们。那个时候市面上副食品几乎看不到了,代之以红薯、南瓜之类。至今我见到南瓜有点反胃，就是那个年代吃得太多了。我记得当时的葱油桃酥是唯一可以买得起的点心,偶然打打牙祭。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幸

